

“后世界”的逆袭与清算^{〔*〕}

——西方“形而上学”概念的演变与存疑

余乃忠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形而上学从古希腊诞生到现在,支撑了整个西方文明大厦从初创到辉煌,再到今天的黯然失色,其演进之路映射了西方文明的起伏与进退。从亚里士多德的“是其所是”到康德经验彼岸的“常驻”,再到休谟的“根本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和马克思的“间离现实的思辨”以及恩格斯的“反辩证法”,经历了从建构到拆解的全部完成。然而,后现代主义在“没有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解构进程中,逆向演绎了一段新的“后世界”神曲,其多姿斑斓的呈现,迷离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现代生活中的形而上学在形式上学的主导下,散发出更多生态化的对峙与不确定性。

〔关键词〕形而上学;概念;演变;存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3.007

形而上学最早是指亚里士多德的一组论文的题目。因编辑者在编辑《亚里士多德选集》的过程中把这组论文放在《物理学》之后而得名。中文译名“形而上学”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由日本明治时期井上哲次郎翻译而来。

一、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

古希腊自然哲学奠定了西方文明与形而上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线索与特色。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公元前480年)认为,人类具有驾

驭“一切事物”的本性,所以需要区别具体事物的特殊知识的“统一知识”,即能够统领全部事物的知识。而事物的全部是火的交换物,火又是所有物的交换物,正如黄金与万物,万物与黄金,即火是驾驭一切的“统一知识”。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后)是存在论哲学的始祖,存在是其最基本的范畴。巴门尼德的最大贡献和历史转折是克服了希腊自然哲学始基纷杂的弊端,使其统一于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动的、不可分的、超感的“存在”。巴门尼德对古希腊哲学及其后来整个西方哲学,特别

作者简介:余乃忠,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研究”(19BZX005)的研究成果。

是整个存在论家族影响巨大。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把他所关心的形而上学学科称为第一哲学。他在《形而上学》中回溯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年)忙于伦理问题,却遗忘了作为整体的自然界。苏格拉底想在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真理,于是开始对事物进行定义。而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主张将问题从可感事物转移到实是上去,因为感性事物变化不定,也就无法为其定义。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事物之存在效于数”被柏拉图改为“事物之存在参于意式”,至于如何对通式“参”和“效”,他们没有说明。柏拉图认为,通式既为其他一切事物之因,则通式之要素即为其他一切事物之要素。柏拉图同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元一是本体,不是其他实是,数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但柏拉图主张,数可以离开具体可感物而独立存在,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认为事物即为数,两者出现了分歧。最后,柏拉图认为,通式就是一切事物如何是其所是。同时,柏拉图赞同巴门尼德关于真理与意见两条道路的区分,人类认识应从繁杂的现象转向单一的“永恒不变”。基于此,柏拉图提出理念论,这是对早期希腊哲学理论的一种综合。理念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类,不同的类有不同的理念,总的理念构成了理念世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柏拉图的理念不是来自于对经验中的个别进行归纳和抽象。相反,理念先于经验。经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于我们心灵中的理念的派生与分有,所以才有“学习就是回忆”。柏拉图以理念的先验、纯粹、绝对、永恒的存在构建了其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后被称为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走向影响巨大,并在黑格尔主义中得到了最高阐扬。

在对前人理论的分析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有人主张物质有一种或多种,物质是实体或不是实体,都考虑到事物的原因,但没有人掌握事物如何是其所是。因此,他在《形而上学》中

说:“于‘怎是’,或本体实是,没有人做过清楚的说明。相信通式的人于此有所暗示;他们不以通式为可感事物的物质,不以元一为通式的物质,也不以通式为动变的来源,他们认为一个通式如当它为动变之源,毋宁作为静持之源,这就是使通式成为其他一切事物的怎是而元一则成为通式的怎是。”^[1]而那些主张宇宙唯一于物质,而物质又专指那些具有量度的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们显然走入歧途了。

亚里士多德指责了其他学派对于本体、要素、动因、原理等理解上的偏差而不得要领,最后总结到,人们似乎都在寻求我们在“物学”中所指明的诸原因,我们再没有找到其他原因。至于何为其他原因,他终于坦露出他的真正观点:“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2]亚里士多德强调,这是寻求最高原因和第一原因的基本原理,或所以称其为实是的要素。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形而上学的基本定义。由于他探求的是事物的第一原因、最高原因,这一学科则被称为第一哲学,而物理、数学则被称为第二、第三哲学。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本体,就是实是,所谓的秉赋;二是本体为何成为本体。即一个是“存在”,另一个是“是”。

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实是”是原理,“元一”是原因,即“存在”和“是”它们本是同一事物,但并不用同一公式来说明。他还强调,有多少类本体就有多少分支,因此,这门学术中必定有第一义和相从的各义。这个第一义就是第一哲学。尽管亚里士多德指责包括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内的一切思想家未能在“是其所是”上取得任何进展,但他自己提出问题后,做了大量的重复性解释,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除了自相矛盾外,并未如其所愿,最后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通式或公式,或者应有的秉赋。或许,始终在原地反复叨念就是其自身的通式或秉赋。

公元前 323 年,亚里士多德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离开雅典回到母亲故地过隐居生活。一年后病逝。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考虑的问题早被先他一百多年的巴门尼德做了深入的阐述。亚里士多德通过歪曲和贬低前人的思考夸大自己思想的重要性和原创性。对前人的责难,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恶劣的开始,以至于后来成为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到了希腊晚期,哲学逐步被确认为包括物理学(本体论)、伦理学(人类本性与言行的研究)和逻辑学(人类秩序性把握世界的方式)。

二、中世纪的形而上学

如果说希腊神话与希腊哲学是同一种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中国巫术与中国先秦哲学是中国同一个文化源头的两种不同形态,那么基督教与基督教哲学则同属希伯来文明的两个不同方面。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经过数百年的对抗与融合,到中世纪已经基本定型。一般认为,基督教哲学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结合,实际上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从诞生那天起就已经蕴藏了希腊哲学的语言与思维,即信仰与理性并非完全决裂,以致于《新约》的作者们采用了希腊哲学中“逻各斯”“精神”“灵魂”“肉体”“种子”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其实,任何信仰之中都会有理性,任何理性之中都会有信仰。因此,基督教哲学始终贯穿信仰与理性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基督教哲学需要以自己的哲学特色区别于希腊哲学,另一方面又要以理性主义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早期的教父哲学分为理性辩护主义和反理性辩护主义的信仰主义。古罗马神学思想家,也是第一个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因其极端信仰主义而被主流教会所不容。但德尔图良因提出“本质(Substance)”概念和“唯其荒谬,我才信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而载入史册。荒谬意味着非凡、奇迹、超能力和不可能的可能。理性辩护主义的杰出代表奥古斯丁主导了教父哲学的发展方向。

奥里留·奥古斯丁生于罗马帝国的北非,受

罗马文化的影响极深。他之所以获得广泛的影响是因为他一方面称基督教为“真正的哲学”,另一方面也吸收和改造现世哲学到基督教哲学之中,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与参与。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提出“我怀疑,故我存在”的著名论辩,被认为是为 17 世纪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创造了认识论与本体论范式。奥古斯丁把知识分为有形事物、外感觉、内感觉和理性不同的等级,真理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在这些有等级的人类知识之上,存在一个外在的处于最高位置的真理,即上帝。理性知识与信仰知识在奥古斯丁这里得到最好的统一,既维护了基督教的最高尊严,克服了希腊哲学思辨的弊端,又为基督教注入了辩护的理论依据。

在此,奥古斯丁构造了基督教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即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不仅建构了上帝本体论,而且提出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桥梁,但这种建构也必然是矛盾和失败的。因为,奥古斯丁虽然强调了理性主义的感性、理性、记忆、概念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但如何让“光”照进自我的灵魂,核心还是对“光”的信仰。奥古斯丁说:“我的天主,我真正的生命,我该做什么?我将超越我本身名为记忆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温柔的光明。”^[3]主高高在上照耀着我,我将凭借我的心神触摸到你,而拥有超越我自身的一切力量投入到你的怀抱。寻求主的过程,就是寻求幸福和自己灵魂的过程。信仰在这里不仅是认识的前提,也是认识的精髓。信仰看似引导感性、记忆到理性、概念,实际上是以信仰代替,甚至超越理性,即有信仰的人,记忆才会深邃、伟大,才能把真理集中起来。奥古斯丁的形而上学论证过程以克服信仰的非理性和希腊形而上学思辨的双重目的,最终却是以希腊的思辨方法复活了非理性根基。

从 11 世纪下半叶起,教父哲学随着经院的发展过渡到经院哲学,烦琐思辨的希腊哲学风格在经院哲学中得到了恢复。安瑟尔谟以上帝存

在的“本体论证明”呈现了经院哲学的全部困境,以致于唯名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人比埃尔·阿伯拉尔力图在辩证神学框架下,反对教会的权威,冲破教会的束缚。他在《是与否》中,对上帝的存在与上帝是否全知全能都提出了怀疑。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斗争持续了数百年,耗尽了经院哲学的全部元气。在今天看来,两者之争既是一个哲学上的抽象合理性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以五种“科学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被称为奠定了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几百年里堪称上帝存在的标准证明。他提出,存在高于、优于和先于本质。本质依赖于存在,没有存在,就没有实在的本质。阿奎那的形而上学以存在和本质关系的学说为枢纽,对实体的等级、构造与类别做了全面论述。阿奎那的一切到了18世纪,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他把实体分为上帝、精神、物质,看似是希腊实体论的发展,实际上不仅背叛了传统实体论,还处处自相矛盾。上帝的五种证明不过是一种信仰,五种诡辩。他在哲学史和形而上学上的贡献远远被高估了,仅仅是中世纪的一种炼金术或占星术而已。休谟指出:“他们由于当代人的乖巧无知也能享受暂时的好名声,但他们并不能在较公道的后人面前维持住他们的好名声。一个深奥的哲学家在他的玄虚的推理中很容易陷入错误。”^[4]因为一直推理下去,即使出现与经验明显不符也不会否定整个推理体系和总体结论。对于西方思想上所有的深奥的哲学家来说,当他们离开暗处而走到阳光下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玄虚都会烟消云散。这也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宿命。

三、德国古典哲学重建的形而上学

尽管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获得了巨大的繁荣,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失去了其庄严和神圣。后来在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下更是日渐式微,但却得到了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重建。物理学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形而上学到宇宙知识的学说。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

把人类知识体系确认为树根(形而上学)、树干(物理学)和树枝(其他知识)。德国哲学心理学家、数学家沃尔夫把知识概括为四个方面:存在论(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关于灵魂的理论)、理性宇宙论(关于自然世界的理论)、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及其信仰的理论)。这一分类得到后来大部分哲学家的认同,哲学从此成为形而上学的代名词。

尽管科学史上,科学都是在形而上学的胚胎里孕育成熟而分化出去的,但今天所存在的科学假说并不能等同于形而上学。科学假说是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于科学基础和经验事实的一种绝对信念或实体。历史不可思议地巧合成:“形而上学”原先的编纂学含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其真正属性。康德说:“形而上学知识结构的诸般原则(不仅包括它的原理,而且也包括它的基本概念)必然绝不是取自经验的:因为它不应当是物理学的知识,而应当是物理学之后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经验彼岸的知识。”^[5]因此,康德进一步表明,人们在形而上学里面可以从各种方式随意行事,不用担心被发现不正确,因为在纯然理念的场合,我们永远不能被经验所反驳。康德这里不仅说明了形而上学名称的历史合理性和知识合理性,也表达了他试图重建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信念和决心。

康德强调,形而上学在纯粹理性的辩证尝试中把我们引导到极限。这种尝试不是任意而为,而是理性本身所迫使。“因为,形而上学也许比其他任何一门科学都更多地是由自然本身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置于我们里面的,根本不能被视为一种任意选择的产物,或者被视为经验(形而上学与经验完全分离)的进程中的偶然扩展。”^[6]尽管康德对于数学和形而上学作了不厌其烦的区分,为的是证明形而上学与经验的完全决裂。另一方面,对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本体观,康德作了更为精确的规定。在其看来:“如果在经验中没有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某物,即某种常驻的和持久的东西作为基础,其一切变易和同时

存在都只不过是这种持久的东西实存的诸多方式(时间的模式),我们仅仅通过把握就绝不能确定这种作为经验对象的杂多是同时存在的还是相继存在的。”^[7]这种持久物在康德看来是一些经验的基底,一切时间唯有借助它才有可能。至此,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三个含义在康德这里得到了确立:一是世界的本源,二是超感性,三是永恒不变性。

不过,康德注意到,一切华而不实的智慧都有它存续的时间,形而上学从繁荣走向衰弱的时刻已经来临。曾经有一段时间,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但现在的流行却对它表示出像驱赶老妇一样遭到一切的轻视和遗弃。尽管大学仍有形而上学学科,但形而上学不再列入缜密的科学范围,有才智的人也不再选择形而上学专业。同时康德认为,自从形而上学诞生以来,还没有谁像大卫·休谟如此这般对形而上学的攻击性大。尽管在康德看来,休谟的论点多么的草率和错误,但这种提醒对于打破长期的独断论迷梦给予思辨哲学一个新的方向。因此,康德党的梦想是试图构建一个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至于如何建构,则主要通过“批判,而且也唯有批判,才包含着能够实现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经过充分检验和证实的实施方案,乃至一切实施手段。通过别的途径和手段不能可能”^[8]。仅仅通过一个宏大叙事的批判概念来解决科学化途径,不仅非常的草率,同时也进一步把形而上学推向非科学化。

不难看出,康德在形而上学的重建道路上试图给予形而上学新的生命,但它除了显示更加烦琐和毫无伦次之外,并没有给出比亚里士多德更多的启示。以至于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前言中说:“这些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就叫做形而上学。”^[9]一切都是形而上学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即康德在神秘的形而上学大厦面前屈服了。他不能重建也不能走进和把握形而上学,所以不得不把一切都归为形而上学。

类似于康德,黑格尔也似乎看出传统形而上

学的缺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是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对于这些规定的多样性及其有限的效用,也缺乏一个根本原则。”^[10]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样需要重建,但他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在超验上无休止地重申,而是在古希腊的逻辑体系上,通过逻辑范畴进行抽象化,并让其成为一种方法和根本性原则贯穿于他的思想的各个部分和环节。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其看来,在自然界,特别是人类出现之前,宇宙中就存在一种具有宇宙特有属性的绝对精神统领一切。但绝对精神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处于辩证发展之中。绝对精神的第一阶段是逻辑阶段,自然界和物质还没有出现,即宇宙尚未进化出今天我们看到的自然界。此时,绝对精神只是在纯粹思维的范围运动。当达到突破纯粹思维的自我否定的阶段,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此时,思想、概念都被自然和物质包装起来。而思想、观念又继续发展,终于突破自然的外壳,进入到第三阶段。此时,人类的出现使绝对精神回到与它本性相适应的阶段。这是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一切矛盾都调和了,绝对精神进入了完美状态。在黑格尔眼里,此时人类形而上学和哲学史全部完成了,普鲁士政治就是这种绝对精神最好的体现。黑格尔为了证明德国政治的完美与合法性绕了一个大圈,超越了自然界。康德与黑格尔自以为走到了工匠之巅,以最伟大的使命,重建了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大厦,也铸就了最伟大的历史笑柄。

四、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形而上学

围绕绝对精神,黑格尔阐释了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并贯穿于辩证法的法宝。绝对精神中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索,黑格尔也由此开始了其保守与先锋的双重人生。用自我矛盾(黑格尔认定,处于万物变化中的德国政治不会变)的动力注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想象总是超越历史,历史也永远超越想

象)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形而上学的概念界定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与黑格尔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马克思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形而上学的弊端和危害的人,但他是人类思想史上对形而上学批判最彻底的人。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它不崇拜任何东西。马克思认定,按其本质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同样,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受到恩格斯的充分肯定:“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11]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评自然科学留下的后遗症,“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2]恩格斯这里把辩证法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面予以肯定,实际上也说明了恩格斯对于形而上学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13]即黑格尔、蒲鲁东等人试图用抽象的方法接近事物,但结果是相反的。同时,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

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14]即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是以方法来连接概念、逻辑和思想的运动。而且,这种方法的灵魂就是绝对精神。而何为黑格尔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就是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自我意识的设定,把自身规定为命题,并进行思辨运动。

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破缺,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5]即就是说,黑格尔把观念作为“后世界”的形而上学性。

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做了专门的阐述:“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6]这种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在德国流行,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德国人民现实生活的胚芽一向都是在这些哲学家脑壳里萌生的。至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给予黑格尔等德国法哲学的彻底批判,也同时阐明了他对形而上学概念的另一划定,即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

因此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观脱离历史,落入形而上学的圈套,而且,辩证法自身的规定也需要历史观的颠倒,因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的结合是绝不会把辩证法贯彻到底。所以,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受到了批判。1828年,24岁的费尔巴哈致信黑格尔,称其思想为纯粹逻各斯的化身,因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然而,1839年,

费尔巴哈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一篇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通过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揭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宣告转向唯物主义。1841年，他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使得人本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费尔巴哈把人看做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人乃是理性的尺度，不是理性在思维，而是人在思维。费尔巴哈认为，推翻了上帝，我们得到了人；颠倒了黑格尔哲学，我们得到了唯物主义。后来鲍威尔、斯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高举“批判的批判”大旗，试图为黑格尔形而上学正名。鲍威尔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在纯粹批判面前，自由的人的无限自我意识不容许有肯定的存在。谁肯定真理，谁就皈依了上帝，结果，鲍威尔以自我意识扬弃了上帝。1845年斯蒂纳发表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严厉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两个颠倒。斯蒂纳认为，费尔巴哈主词与谓词的颠倒，不过是剥去了一层旧宗教，披上了一层新宗教，恰恰说明神是人的真正内在性。斯蒂纳要打倒个人之外的世界的一切，让“我”彻底解放，回到自己那里去。这样，斯蒂纳则以“唯一者”扬弃了“类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文章中予以了全面的论战。最终，思辨主义以“自我意识”和“精神代替现实的人”成为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掘墓人。虽然费尔巴哈被斯蒂纳打败了，但斯蒂纳、鲍威尔没有能够逾越过马克思。马克思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终结了青年黑格尔派，不仅彻底终结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形而上学，也终结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形而上学。

五、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形而上学

后现代主义的出场，不仅改变了人类对知识的态度，也改变了哲学自身的命运。某种程度上说，形而上学的命运就是哲学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形而上学观为僵而不死的形而上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尼采看来，理性乃是表面现象的哲

学。康德哲学“最大的谎言乃是关于认识的谎言。人们想知道自在之物具有何种性质；可是看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在之物！”^[17]尼采指出，先验论者天真地在某个地方设定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却能与人类的愿望相合，而且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我们可认识的世界不过是人类的错觉。真实就是符合心灵，符合理性。休谟所说的“根本就没有先天综合判断”，得到了尼采的坚定支持，而康德把数学等同于先天综合判断受到了尼采的坚决批判。

尼采认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都处于道德的统治之下。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谈到：“现代最普遍的标志：人类在自己的心目中已经不可思议地丧失了尊严。长期地作为此在(Dasein)的中心和悲剧英雄；……就像所有形而上学家所做的那样，他们意欲坚守人类的尊严，并且相信道德价值乃是基本价值。”^[18]尼采确定，康德哲学的最污秽之处就在于区分现象的“自在之物”和道德学说。“我们既不愿意以康德的方式受骗上当，也不愿意以黑格尔的方式受骗上当——我们不再像他们那样相信道德了。”^[19]以道德为哲学的基础以及为道德保持权利在尼采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同时，尼采强调：“形而上学家……出于对无条件权威的习惯，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对无条件权威的深刻需要。”^[20]在康德时代里，批判本身就表明比批判的需要更优越。在方法上，尼采也公开声明反对抽象。至此，可以推断，尼采的形而上学概念即为与事实相违背的思想与行为，特别是追本和抽象。但是，尼采以权力意志为现代精神与制度的统率，具有新的“存在”踪迹和存在形而上学的“抽象”疑云，因为在他看来：“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除了权力等级——假如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话。”^[21]然而，继承了尼采“此在”概念，并认为尼采反形而上学不彻底的海德格尔却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更趋近于康德。

不同于传统的差异，德里达独创了“延异”概念，为了表达一种差异的差异。在德里达看

来,“延异”比存在更古老,更原始,更本真。延异,它没有意义,它不是概念。它不属于范畴。它没有支撑,没有深度,置于嬉戏中。德里达试图对于传统存在者和存在论的本体论进行逆袭,他强调,无处不在的延异要动摇的正是存在者的先天命令。将存在确定为在场或存在状态正是延异所责难的。无处不在的延异反对的正是存在。德里达看来,正是这种反逻辑的逻辑构成了延异形而上学。“对我们来说,延异仍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它在我们语言中所接受的所有名称,作为名称,仍是形而上学的。”^[22]不过,德里达的形而上学概念尽管制造了理性的冲突,但仍属于本体论形而上学范畴。

鲍德里亚说:“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非决定性和代码的形而上学。”^[23]辩证进化结束了,现在支配生命的是遗传密码的间断性非决定论,已经写入代码。这些符号不可解读、不能阐释,是黑洞中的幽灵,这种不确定性控制着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的生产。不难看到,在鲍德里亚这里,形而上学概念被理解为一个时期一种主导的哲学思维模式。在其看来,主体哲学、生产关系、现代主义都可能被称为形而上学。

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无论从生产、精神、艺术和政治,乃至革命与战争都失去了传统的严肃性和尊严,代替这种严肃性的游戏概念取得了人类生命本色的位置。游戏概念的极大外延远不限于娱乐和体育的竞技。福柯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在所有这些复杂的、重叠着的东西中,您可以看到一种制度的游戏:阶级关系、职业矛盾、知识模式乃至整个历史以及主体和理性都参加了进来。”^[24]即游戏成为了社会存在和基本生活形态。这种根基式的存在,在布尔迪厄看来:“我们只需像观察者那样置身于游戏之外,与赌注无关,就能消除紧迫性、诱惑、威胁、要遵循的步骤,而正是这一切产生了实在世界,亦即被实际居住的世界。”^[25]即游戏产生了紧迫性和诱惑等一切,而这一切构成了实际世界。游戏的本体化反

映了后现代主义本体概念从超验向经验的转向。本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制,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抽象体制内在化的“后世界”。

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给予传统主义理想以致命的打击,康德说:“非理性(它是某种积极的东西,不仅仅是缺乏理性)与理性一样,仅仅是能够使客体与之相适应的一种形式,因此,二者都着眼于普遍的东西。”^[26]如果非理性注定存在一种普遍性,是否也应成为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也可以定义为用普遍性的尊严压迫个体的特殊价值。后现代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态度是矛盾和暧昧的,不像古典理性主义那样对形而上学的极度遵从,也不像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那样对形而上学仇视,他们在批判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介入形而上学。他们对理性主义的突袭与其说是锋锐的,不如说是迟疑和休止的,因为他们无法实现对人类知识的绝对支配与超越。

六、后记:走向现代生活的形而上学

历史上,形而上学探求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是人自我认识独立的标志,又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人可说是形而上学天生的动物,只要不是单纯的存活,就会考虑终结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难以直接通过经验获得。由于经验只展现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经验一般并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我们面临生活的艰难抉择或者经历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痛苦时,追问存在意义的存在者,即此在(Dasein),我们才会对“形而上学”这门学问产生渴求。

但是,由于形而上学不能像科学那样给予确凿的答案,因此形而上学多次被鄙弃。尽管对形而上学怀以憧憬的人试图证明,形而上学接近于宗教,给予我们信念与智慧。但在科学实证时代,无根基的信念并不可靠,没有实证的智慧也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的精确度。与其说形而上学能够给予我们生活的启示,不如说它使我们更加迷失。

形而上学概念在经历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数次演变,其内涵显得更加丰富、广泛、世界化和充满歧义。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位哲学家能够给予形而上学一个规范的普遍性定义,但它在演变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各种可能的理解已经深深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在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生活中,却又处处充满形而上学的仪式、话语和情绪。

重外在形式多于内在实际内容的现代形而上学生活已成为一种世界文化。这是现代汉语对于形而上学概念在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实现了形而上学从“后世界”向“表世界”、思辨向直言的双重转向,实现“形式上学”原初的承诺,即形式主义。“形式上学”已呈现六种形态:(1)形式与符号成为最高原则。外观、包装、涂层、称号、吉利数字、知名度、名誉日益成为人的“本质”,名不副实正演化为一种文化,名高于实已成为深度根植的意识形态。(2)创新驱动异化为概念驱动。现代性的膨胀与事实世界的差距,以至于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概念浮夸的日益膨胀之中。(3)“绝对真理”的无的放矢和解释一切。“双方保持克制”“股市近期处于震荡态势,投资者应谨慎操作”。(4)“粗暴”的悖论。“虽然没有统一,但也没有分裂”“虽不是男的,但也不是女的”。这类新思维给予形而上学概念更宽广的解释,现代形而上学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对文明冲突的一种论证。(5)没有根、本质的“独立精神”漂浮在“空气”之中挥之不去。“烦”正从现象走向本体,具有先天、根本、没有理由和不可克服的规定。“烦”已成为一种饱蘸现代性的人类生命底色,即新的经验中的超验“存在”。(6)数据已成为“无本质”的本质。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生活是数据化的生活。以数据论政绩,论发展。数据是物质,也是精神。数据主义是行

为,也是思维。

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学科,已被分化为艺术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技术形而上学、生产形而上学、知识形而上学、关系形而上学、生活形而上学等,也许研究会更加深入,但未来的形而上学之路和反对之路,从概念到现实化,充满悬疑。在消解“此在”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重新确立清算“后世界”和“表世界”的坐标。

注释: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9-20、58页。

[3][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1页。

[4][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0页。

[5][6][7][8][9][26]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358、119、271、5、212页。

[10][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页。

[1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111-1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13][1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137、8-9页。

[17][18][19][20][21][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6-167、294-295、192、299、251页。

[22][法]德里达:《延异》,汪民安译,《外国哲学》2000年第1期。

[23][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第80页。

[24]《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第496-497页。

[25][法]布尔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